

近代上海周边地区的市镇人口

——以宝山、嘉定为例

游欢孙

【摘要】 文章对民国前期宝山、嘉定的市镇经济与市镇人口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探讨,结果显示,民国前期宝山的城乡人口结构已经向近代类型转变,而嘉定的市镇人口职业构成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格局,两者的差异说明,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能量聚集过程,在城市本身商业机能获得充足发展以前,其对周边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进程的影响是有限的。

【关键词】 市镇人口 城市经济 人口城镇化

【作者】 游欢孙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关于前近代与近代江南市镇人口与城镇化水平的探讨,以刘石吉与包伟民的研究最为全面。刘石吉(1987)以地方志资料为基础,描绘了明清江南地区一些较大市镇的分布情形,指出太湖周边苏、松、太、常、杭、嘉、湖等地,是前近代江南城镇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市镇聚集人口也最多。清末以来,上海附近市镇膨胀,不乏万户大镇,乃至成为上海市区的一部分,通商口岸经济的影响与太平天国的作用是最重要因素。包伟民(1998),把近代江南农村市镇人口聚居类型分为“嘉兴”、“鄞县”两种类型。他认为,就近代整个江南地区的农村人口城镇化进程而言,远未突破自传统时期延续而来的市镇人口区域类型结构。但局部而论,江南市镇人口的发展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主要表现在以传统市镇经济为基础的市镇人口的衰减与受近代工业发展影响之市镇人口的增长。他认为,口岸城市对农村地区影响的局限性,即便是对近在咫尺的周围农村地区,在没有做出深入的专门研究之前,很难确定。

本文在包伟民研究的基础上,以宝山、嘉定为例,探讨传统时期宝山、嘉定的市镇经济与市镇人口在步入近代以后有何变化;近代上海城市经济对宝山、嘉定市镇经济与市镇人口发展有何影响,其具体表现与结果又是如何。并试图说明近代工业城市的发展对周边农村地区影响的局限性问题。

一、清末地方自治时期宝山、嘉定的市镇与镇区^①

地方志资料显示,迟至明万历年间,后世嘉定、宝山境内最主要的一些市镇,均已在境内几条主干河流旁出现^②。随着棉花种植与棉纺业的推广兴起,嘉定、宝山地区出现了许多以棉花与棉布贸易闻名的市镇,其中如南翔、罗店、外冈等镇聚集了许多徽州和苏州商人,他们在镇上开庄设店,从事棉花与棉布的收购与转运贸易。

至光绪初年,宝山、嘉定境内总共存在着 38 个大大小小的市镇。然而,在明清时期(民国以前,包括清末)所编撰的 20 多部嘉定市镇志中,均无对市镇户口数量的统计,甚至连一般性的描述文字也没有,因而我们无法确定宝山、嘉定地区市镇的人口数量。

^① 按宣统人口普查的区划要求,5 万人口以上的区域设为“镇”,5 万人口以下设为“乡”。这样的“镇”本文称为“镇区”,不是“市镇”。

^② 万历《嘉定县志》,卷 1,《市镇》。雍正二年(1724 年),嘉定县分出东境的依仁等 4 乡建立宝山县。

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全面系统的宝山、嘉定各乡镇人口资料为清末地方自治时期的城乡人口普查数据(见表1)。作为清末筹备立宪的重要举措之一,宣统人口普查是根据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民政部奏定的《调查户口章程》而进行的,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选举国会两院议员和划分自治区域,普及教育,征集民兵,整理租税等项(侯杨方,2001;曹树基,2001)。当时江苏各属的人口普查与自治相辅而行,至宣统二年(1910年)十月,江苏各属将“五府州属及京口驻防以逮租界华洋各籍,共正户1 697 499户,附户472 629户,填列表册汇报民政部”^①。嗣后,江苏各属又遵照民政部颁定表式,分别男丁、女口及附查学童、壮丁各数,饬属呈报。

由表1可知,1910年宝山总人口266 910,总户数53 712户,户均口数为5,但罗店、吴淞二乡户均口数似乎过高。就嘉定而言,不计严庙、吴巷、曹王庙,则宣统三年(1911年)嘉定全县43 727户,总人口205 513人,户均口数4.7,男女性别比为112,均较为合理。分乡而论,户均口数都在5左右,男女性别比也都在110左右,城区及近郊(西门、澄桥乡)以及拥有较大工商业市镇的乡域(如钱门塘、葛隆、安亭、黄渡、南翔、娄塘等乡)的男女性别比多在115以上,也都比较合理。单就户均口数论,嘉定的人口普查质量似乎要比宝山好一些。

清末地方自治章程规定,人口满5万以上者办镇自治,不及5万者办乡自治。民国《嘉定县志》的编撰者又说,“嘉定巨镇,首推南翔,而人口尚万七千有奇,去镇自治之标准犹远,故吾邑无镇自治,但

表1 清末地方自治时期的宝山、嘉定城乡户口

城乡别	户数	口数	户均口数	性别比	所属市镇	所属村庄	城乡别	户数	口数	户均口数	性别比	所属市镇	所属村庄
城市	2206	9515	4.3				大场乡	6029	26931	4.5			
罗店市	9406	54899	5.8				真如乡	4141	18979	4.6			
杨行乡	2981	13839	4.6				彭浦乡	1895	9098	4.8			
月浦乡	3964	17672	4.5				江湾乡	5692	28562	5			
盛桥乡	2262	10576	4.7				殷行乡	2998	13193	4.4			
刘行乡	2461	10949	4.4				吴淞乡	3327	21714	6.5			
城区	1783	9220	5.2	114	1	19	江桥	473	2082	4.4	109		24
西门	1309	6479	4.9	121	2	138	陈店	1103	5088	4.6	105		80
石冈	1445	6744	4.7	111	1	92	南翔	3745	17564	4.7	126		85
澄桥	1269	5618	4.4	117	2	120	真圣堂	1789	8642	4.8	99	2	139
白荡	683	3240	4.7	103		71	马陆	2676	12415	4.6	114		104
六里桥	536	2419	4.5	100		55	西胜塘	417	2001	4.8	104	1	37
外冈	1460	6218	4.3	107	1	88	小红庙	1944	8559	4.4	116	1	108
严庙		5260		118	1	92	广福	1874	8313	4.4	114	1	125
钱门塘	752	3391	4.5	117	1	47	徐行	1993	9265	4.6	113	1	94
望仙桥	770	3814	5	105	1	73	樊桥	1224	5618	4.6	117	2	95
葛隆	851	4615	5.4	117	1	71	新店	1177	6363	5.4	113	1	93
方泰	1949	9419	4.8	105	1	150	唐行	1245	5688	4.6	113	1	88
安亭	1231	6165	5	116	1	91	庵桥	1069	4994	4.7	107	1	101
黄渡	1778	8610	4.8	118	1	129	吴巷		2831			1	38
纪王庙	1744	8309	4.8	109		99	曹王庙		7078				45
诸翟	1012	4343	4.3	105		49	娄塘	1677	7511	4.5	123	1	75
封浜	1771	8489	4.8	105	1	120	陆渡桥	978	4317	4.5	116	1	129

注:(1)表1上部分属宝山县、下部分属嘉定县;(2)嘉定县内严庙乡未有户数,吴巷乡、曹王庙乡户数及男女口数未曾记载,系原表如此。

资料来源: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户口》(未记载各市乡男女人口数及所属市镇村庄数);民国《嘉定县续志》,卷6,《自治志》、《户口表》、《区域界址及市镇村庄表》。

① 清民政部:《调查户口章程折》,《大清法规大全(光绪辛丑迄宣统乙酉)》,卷6,政学社印本,1910年。

办城乡自治”^①。对照表1中南翔乡人口(男女共17 514人),可知时人所谓的“巨镇”南翔,即一般意义上从市镇商业繁荣程度上所说的市镇。又光绪初年,南翔镇“东西五里,南北三里”(15方里)^②,民国十九年(1930年)前后,南翔镇“街衢南北五里,东西六里”(30方里)^③,而宣统三年南翔乡的地域面积(约为55方里),实为当时南翔镇镇区(包括周边85个村庄)的整个区域面积^④。在当时看来,这个区域都属于南翔镇。

结合以上分析及表1可知,清末宝山、嘉定虽不乏人口2万(如南翔、月浦、大场、真如、江湾、吴淞)甚至5万以上(罗店)的自治区域,但这些自治区域一般包括一个或几个市镇、若干个村集及其周边为数众多的乡村,而并不专指某一市镇的地域范围。因而,我们还不能确定具体市镇的市镇人口。

二、民国前期宝山的市镇发展与市镇人口

地方志资料显示^⑤,自光绪初年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受上海城市经济及近代交通的影响,宝山境内尤其是与上海毗邻的市镇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又以吴淞、江湾为最。吴淞当江海入口处,上海开埠通商以后,为商船必经之地,“铺户如栉”。江湾则因为紧邻租界,加之淞沪铁路与近代公路的兴修,外人争租地杂居经营。20世纪20年代,江湾镇市街东西长五里,南北广一里,以秋间棉市最为兴旺,大小商铺三百余家,“其骛骛日上之势,殆将甲于全邑市乡。”^⑥此外,由于近代交通、工商业的发展与学校的兴建,宝山东部及南部尤其是江湾地区出现了许多的新兴市集,其中潭子湾的发展甚至已经超过了所属的彭浦镇。这些都显示了民国前期宝山南境市镇经济的快速发展(见表2)。

同期宝山县人口的增长也反映了市镇发展的状况(见表3)。1910~1926年间,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宝山南境,主要集中于真如、彭浦、江湾、吴淞、闸北等地。1926年,宝山客民数量(127 294人)占全县总人口(468 391人)的27.3%。仅南境彭浦、江湾、吴淞、闸北四地的客民数量就达120 797人,客民比例分别达到45.8%、21.1%、34.8%、62.7%。同期,宝山总人口也由266 910增长到468 391,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5.8%。另据民国《宝山县再续志》的记载,仅1907~1928年的20年间,宝山境内新建的近代工厂就多达76家,工人总数13 000余名,其中闸北44家,工人6 000余人^⑦,彭浦19家,工人数4 221,江湾10家,工人数2 082^⑧。显然,这一时期内宝山的人口增长,主要是近代工业对就业人口的吸纳所致,这种增长已不再是一个人口的自然增长,而是一个区域人口城市化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对宝山市镇经济与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也有消极的一面,这一点在吴淞商埠计划的举而复罢上体现得最为明显^⑨(汪敬虞,1989)。

与闸北自治区的建立相比,建立吴淞商埠的计划提出得更早。早在光绪中叶,上海的英国商人就屡次以宝山吴淞口外拦江淤涨,巨型商船入口不便、驳运繁费为由,由英领事转禀英国驻京公使,要

① 民国《嘉定县续志》,卷1,《自治分区》。

② 光绪《嘉定县志》,卷1,《市镇》。

③ 民国《嘉定县续志》,卷1,《市镇》。

④ 民国《嘉定县续志》,卷6,《自治志》,《区域界址及市镇村庄表》。

⑤ 与光绪八年(1882年)《宝山县志》对市镇的略略描述不同,民国十年《宝山县续志》与民国二十年《宝山县再续志》对此一时期内市镇的兴衰做了较为详尽的描述,基本显示了民国前期宝山市镇发展的状况。

⑥ 以上均见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市镇》。

⑦ 其中包括商务印书馆1907年于闸北宝山路印刷、编译二部,职员、技师、工匠多达3 000余人,为当时宝山境内最大的工厂。

⑧ 另外城内3家,工人数590人,真如1家,工人数25人。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6,《工业》。

⑨ 关于吴淞商埠计划的提出、搁浅与失败,民国《宝山县续志》,卷6,《商埠·吴淞商埠》有较为详尽的描述,本文的分析以此为基础。

求清政府于吴淞口设立租界,遭到拒绝。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英领事又声称,吴淞口外兵舰拟借用吴淞营地为操场,自强军营务处“据理驳覆”。不久,自强军营务处即电呈南洋大臣刘坤一,请自开商埠,翌年三月,刘坤一以吴淞商埠计划上奏清政府,得到批准。之后不久,总理衙门“复咨行迅速办理”,刘坤一即分别委派开埠督办、会办,设立清查滩地局,并制定《吴淞开埠租买地亩章程》,商埠内清丈、会丈事宜则由自强军营务处沈敦和勘定。而丈出之官地,则由恒源、兴利两公司承领转卖,一时沪商争相购置,地价飞涨。1899 年,吴敦和因拆毁吴淞口南炮台,被劾去职,由候补道沈瑜庆接办,但此时各国外交团以江沙日涨,主张浚深黄浦江,“殊无投资迁地之意”。两年后,清政府与各国订立《浚浦条

表 2 光绪初年至民国二十年宝山县的新兴市集

市乡别	新兴市集	情 形
盛桥	北川沙	茶酒南货等店二十余家,麇聚塘岸之上,近自大川沙开浚后,交通便利,西来船舶皆可直达,贸迁愈形起色
刘行	顾村	商铺三十余家,近以获泾重浚,提倡商业者复注意经营,布庄花行等已逐渐增设
真如	杨家桥	前本荒村,近以邻近铁路车站,又有商埠警察派出所,渐形热闹
	车站镇	在镇东北三里沪宁铁路车站旁,民国九年有中西商店四十余家
彭浦	潭子湾	从前只有村店数家,今则厂店林立,商铺日增,居屋多系新建,帆船往来运输便利,商业进步远逾本镇而上矣
	新桥镇	沪太汽车路旁,民国十四年起有米粮油酒杂货店等十余家
	家井亭	在镇西三里交通路旁,民国十六年起有米粮油酒杂货店等十余家
江湾	天通庵	近以毗连商埠,设有丝厂染织厂等,市面日繁,几与上海商场无异,迥非曩时村集气象矣
	谈家桥	自民国五年开设同茂丝厂并建市房三四十幢,铺户居民渐见繁盛,翌年筑通新闸马路,厂栈益增
	宋家巷	在镇东南殷十图复旦大学后,茶酒杂货店等二十余家
	张家浜	自该处设立车站,始有洋酒杂货等店,渐成村集
	西唐家桥	民国十五年起有米布油酒等店十余家

资料来源:民国十年《宝山县续志》,卷 1,《市镇》;民国二十年《宝山县再续志》,卷 1,《市镇》。

表 3 宣统二年(1910 年)与民国十五年(1926 年)的宝山县人口

市乡别	宣统二年		民国十五年					
	户数	口数	户数	口数	口数(本籍)		口数(客籍)	
					男	女	男	女
城 市	2206	9515	3327	16365	8162	7672	305	226
罗店市	9406	54899	9285	47866	25599	22255	12	
杨行乡	2981	13839	3612	17320	8642	8422	160	96
月浦乡	3964	17672	4513	19846	9944	9715	102	85
盛桥乡	2262	10576	2507	10982	5612	5352	12	6
刘行乡	2461	10949	2747	12407	6259	6148	—	—
广福乡	1809	8474	2216	9943	5099	4802	23	19
大场乡	6029	26931	6331	28626	14371	13342	560	353
真如乡	4141	18979	5788	28602	13218	13350	1488	546
彭浦乡	1895	9098	2905	16126	4333	4403	4611	2779
江湾乡	5692	28562	6774	31606	12772	12158	4605	2071
殷行乡	2998	13193	3332	15803	7223	7383	661	536
吴淞乡	3327	21714	4061	27817	10270	7853	6416	3278
高桥乡	4541	22509	8088	30398	14755	14336	838	469
闸北市	—	—	39204	154684	32439	25208	59226	37811
总 计	53712	266910	104690	468391	178698	162399	79019	48275

注:1912 年,长江口的长兴、石头、鼎兴归并于县城;1913 年,宝山县划出江湾、彭浦两乡南境的一部分,与上海县闸北市合并,成立闸北自治区,简称闸北市,由上海、宝山两县共管。1928 年 7 月,宝山南部闸北、彭浦、高桥、真如、江湾、殷行、吴淞 7 市乡正式划归当时的上海特别市。

资料来源:民国《宝山县续志》,卷 1,《户口》;民国《宝山县续志》,卷 1,《户口》。

约》，而“洋商营业趋势益集中于上海”，吴淞口更无“转移之希望”。1901年，埠工、升科、会丈各局先后被撤销，吴淞商埠计划最终归于失败。

与1913年闸北自治区的建立不同，吴淞商埠计划的失败，可能更多的要归结于上海黄浦江沿岸经济的深度发展，它的失败说明上海城市经济尚处在一个经济能量的聚集过程，只有等到上海城市本身的商业机能得到充足发展以后，它才能不断地对周边地区经济进行辐射，施加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1928年闸北自治区与吴淞等7市乡一起划归上海特别市，视为上海城市中心商业机能取得充足发展后对外扩张的需要与体现。

三、民国前期嘉定的市镇发展与市镇人口

嘉定居宝山之北，离上海稍远，情况有所不同。光绪以后，近代经济因素开始逐步影响嘉定的地方经济发展，其中沪宁铁路的开通^①，改变了原有的商业运输路线，沿线的一些市镇也因交通便捷，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②。此外，洋纱、洋布与洋靛的输入也对嘉定传统市镇经济的支柱产业——土布业、蓝靛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甲午战后，洋纱在嘉定逐渐取代了以前的土纱，如（城市）南门，光绪二十年（1894年）前，布经市极为兴盛，自洋纱盛行后，数年之间，布经营业便完全消失，商业急剧衰弱^③；1905年，布业大镇南翔四周生产的标布，多数已是洋经土纬。全部土纱织的已很少，此后不久，绝大多数已是洋经土纬。与洋纱的输入稍有不同，嘉定的土布业和蓝靛业走向衰落则是在1924年以后。1924～1932年间，南翔镇的土布店关掉了半数以上，万隆、协和等大户都在这期间先后歇业；娄塘镇的布市也比以往减色了许多；自洋靛输入以后，以靛业经营闻名的诸翟、纪王庙、黄渡等镇，转而以棉花（布）、米、麦、豆贸易为主（徐新吾，1992）。由于相关史料尤其是档案资料的缺失^④，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切地了解民国前期嘉定县各市镇人口规模的变化。1928年，嘉定全县改划为8个市、乡，各设行政局，同年又推行街、村制，有集市者为街，无集市者为村。1929年，市乡行政局改为区公所，村、街改编乡镇，另定名称。1930年，全县分14镇、116乡，乡、镇以下改编闾、邻制，全县编1952个闾、9563个邻。由此可知，清末嘉定的1区33乡到1930年最终划分为8区14镇116乡，亦即1911年有集市的乡最终分划为1930年的镇及数个无集市的乡，没有集市的乡则分划为数个更小的乡。由此，可以通过计算每一个市镇的邻数在一区当中所占的比例，推算得到每一个市镇的市镇人口与镇区人口。为便于论述，兹将嘉定县1911～1930年间行政区划的演变列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1930年街村制改变为乡镇制后，嘉定境内总共存在着13个镇（城区分为东城、西城两镇）^⑤。由于没有1930年嘉定各区的人口数字，我们还不能依据各区人口总数及具体镇、乡间邻数在一区所占比例大致推算当时各个市镇的人口数。但1932年侵犯嘉定的日军全部撤走以后^⑥，嘉定

① 沪宁铁路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动工兴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全线通车，沿途由东南而西北经过嘉定境内的陈店、南翔、封浜、真圣堂、黄渡、方泰、安亭等乡。

② 如南翔镇，“自翔沪通轨，贩客往来尤捷，士商之侨寓者又槩至，户口激增，地价房价日贵，日用品亦转昂，市况较曩时殷盛”；安亭镇，“北距沪宁车站三里，交通便捷，市况故较前兴盛”；诸翟镇，“在吴淞江南，距沪宁铁路南翔车站十八里，大小商肆百余家，市况颇旺”。民国《嘉定县续志》，卷1，《市镇》。

③ 民国《嘉定县续志》，卷1，《市镇》。

④ 由于抗日战争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嘉定档案馆保留下来的民国前期的档案资料为数极少（上海附近的县、区一级档案馆也大都如此），从而使相关的研究变得十分困难。

⑤ 民国《嘉定县续志》，卷1，《市镇》中的市镇共有25个，其中包括一些类似于村市的市镇。

⑥ 1932年3月3日，嘉定县城为犯境日军攻陷，史称“三·三”嘉定沦陷，5月5日，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淞沪停战协定》，5月9日下午，嘉定境内的日军全部撤走。

表4 1911~1930年嘉定县行政区划的演变

原属市乡 (1911年)	区名	1930年 乡镇名称	间数	邻数	原属市乡 (1911年)	区名	1930年 乡镇名称	间数	邻数
城市	第一区	东城镇	46	138	葛隆乡		葛隆镇	10	53
		西城镇	43	108			甘庙、旺泾乡	22	112
		东郊乡	22	112		第五区	娄塘镇	30	148
		练西镇	25	124			南升乡	19	90
澄桥乡		皇庆乡	23	86	娄塘、唐行乡		吉金乡	16	79
西门乡		白塘、井亭乡	27	120	娄塘、庵桥乡		太平乡	20	101
西门、严庙、六里乡	第二区	南翔镇	50	249	娄塘、葛隆乡		公塘乡	21	103
南翔乡		南翔、姜人乡	66	332	娄塘、庵桥、陆渡乡		古松、靖龙乡	40	192
徐行乡	第三区	徐行镇	7	33	黄渡乡	第六区	黄渡镇	20	94
		钱桥等6乡	65	333			青盐等8乡	55	271
徐行、澄桥、新庙乡		伏龙、俞桥乡	27	140	西胜乡		西胜乡	18	89
外冈乡	第四区	外冈镇	15	71	纪王乡	第七区	纪王镇	14	68
		保廉等4乡	22	115			高嵩等6乡	65	323
外冈、葛隆乡		集福乡	7	35	诸翟乡		诸翟镇	6	29
望仙乡		望仙桥镇	8	39			双鹤浦等3乡	32	157
钱门塘乡		杨甸等4乡	24	135	安亭乡	第八区	安亭镇	21	104
		钱门塘镇	4	22			漳泾等5乡	36	174
		施村、郭泽乡	19	95					

资料来源:《嘉定县志》,卷1,《建置区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7~71页。

县政府于当年6月进行了战争期间各项损失的调查,记录了各区的战前人口数字。1932年与1930年之间只相差两年,且行政区划没有变动,因而各区人口数量的变化亦当极小,故可以1930年每一个乡镇的间邻数在整个区所占比例来大致推算其人口数量(见表5)。

结合表4、表5,第六区1932年人口为10769人,由94:454可知,黄渡镇的市镇人口约为2230人。第七区1932年人口为13200人,由97:577可知,纪王、诸翟两镇的市镇人口共约为2219人,其中纪王镇约为1556人,诸翟镇约为663人。1932年安亭一乡单独划为第八区,共6327人,由104:278推算,1932年的安亭镇的市镇人口约为2367人;依照同样方法推算,1932年嘉定其他各镇的市镇人口为:第一区,城市10069人,练西镇2877人^①;第二区,南翔镇7402人,第三区,徐行镇815人;第四区,外冈镇2000人,望仙桥镇1098人,钱门塘镇620人,葛隆镇1493人;第五区,娄塘镇1774人。再以同样的方法对1932年嘉定13个市镇的镇区人口进行推算,并与1911年的镇区人口进行对比,可以得出结果(见表6)。

表5 1930、1932年嘉定县各区间邻、户口数

区别	1930年		1932年		区别	1930年		1932年	
	间数	邻数	户数	口数		间数	邻数	户数	口数
第一区	604	2757	15280	68336	第五区	319	1589	8002	38103
第二区	342	1750	10359	52022	第六区	93	454	2326	10769
第三区	276	1438	7662	35515	第七区	117	577	2760	13200
第四区	144	720	4510	20279	第八区	57	278	1344	6327

注:1930年各区间、邻数见《嘉定县志》,卷1,《建置区划》,第67~71页。1932年嘉定,各区户口数据源于《嘉定新声》,1932年11月1日,《全邑兵燹损失一览》,战前嘉定县总人口为244551人。

据表6,与1911年对比,1932年各主要市镇的镇区人口基本没有增长,练西镇、外冈镇、钱门塘镇、诸翟镇、南翔镇的人口更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除了因为市镇经济尤其是土布业的衰落,1924年的“齐

① 从各区间、邻数来看,间邻比为1:5,城区的情况稍有不同,必须要用间数比来推算,否则1930年城区只有6097人,大大低于1911年9220人,按间数比则1930年为10069,比1911年略有增长,澄桥、练西的人口数系第一区总人口68336减去城市人口10069后再以邻数比求得。

表 6 1911、1932 年的嘉定市镇人口

市镇	1911 年		1932 年		市镇	1911 年		1932 年	
	镇区人口	镇区人口	市镇人口	商店数量		镇区人口	镇区人口	市镇人口	商店数量
城区	9220	10069	10069	三百五十家	黄渡镇	8610	8658	2230	二百余家
练西镇	6479	6118	2877	未记载	纪王镇	8309	8945	1556	二百余家
外冈镇	6218	5732	2000	百余家	诸翟镇	4343	4255	663	百余家
钱门塘镇	3391	3295	620	三四十家	南翔镇	17564	17271	7402	四百数十家
望仙桥镇	3814	4901	1098	三十余家	徐行镇	9265	10768	815	二十余家
葛隆镇	4615	4661	1493	五六十家	娄塘镇	7511	8860	1774	百数十家
安亭镇	6165	6327	2367	百余家					

注：1911 年镇区人口见表 1；1932 年镇区人口与市镇人口由推算得出；商店数量引自 1930 年《嘉定县续志》，卷 1，《市镇》。

卢之战”的影响也相当之大^①。

就 1932 年的各市镇的市镇人口与商店数量的比例而言，城区、安亭、黄渡、纪王、诸翟、南翔等镇的市镇人口数量与其拥有的商店数量是大致成正比的。望仙桥、葛隆、徐行等镇的市镇人口数量可能存在高估，主要是因为此三镇在行政区划上的分析整合较大，相对而言，对娄塘镇镇区人口与市镇人口估算的误差，则可能要小一些。此外，练西镇的市镇人口数字也可能存在高估，1930 年的《嘉定县续志》并未记载它的商店数量，甚至并未把它作为市镇加以记载，1928 年的嘉定县政府把它在行政区划上划为第六、七两街，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其地理因素（紧邻县城）而不是商业因素，类似的情况还有澄桥乡，只不过澄桥乡在 1930 年改为东郊乡，而西门乡则改为练西镇。

由于史料的限制，我们现在很难确切地知道民国前期嘉定各市镇人口的职业构成。1934 年嘉定县改划乡镇自治区域时，曾对各区的居民职业构成进行过调查（见表 7）。

虽然 1934 年的调查是分区进行，但可以想见，对工厂、商店数量与工、商、学、政四种人口的调查依然可能集中在各主要市镇当中进行，因而可以认为相当程度反映了市镇人口的职业结构。从调查的数据来看，1934 年嘉定全县只有 9 家工厂，远远少于同时期的宝山。该年，嘉定市镇工商业人口 27 648 人，占总人口的 10.9%，其中工业人口 8 016 人，主要集中在城区与南翔、黄渡、纪王、诸翟等主要市镇，而市镇商业人口（19 632 人）远较工业人口为多。又据 1919 年对全县 235 835 人的职业调查，其中工商业人口 28 174

人，占全县的 11.9%^②。前后比较，1919～1934 年间嘉定的市镇经济基本上没有发展可言，市镇人口的职业构成也基本保持着传统的格局。

1936 年，上海闸北水电公司交流电输入嘉定，一批规模较大的棉纺织、碾米、毛巾企业开始在各

表 7 1934 年嘉定县改划区自治区域调查

区别	市镇数	工厂数	商店数	人口数	居民职业构成				
					农	工	商	学	政
第一区	1	3	462	74076	59039	3778	7334	889	815
第二区	4	4	769	73926	59658	2454	8723	591	444
第三区	1	0	66	36268	35289	254	508	36	不详
第四区	5	1	382	30090	26801	872	1053	331	90
第五区	1	1	289	38725	34853	658	2014	77	39
小计	12	9	1968	253085	215640	8016	19632	1924	1388

注：第一区市镇为城区，第二区 4 个市镇为南翔、黄渡、纪王、诸翟，第三区市镇为徐行，第四区 5 个市镇为外冈、葛隆、望仙桥、钱门塘、安亭，第五区市镇为娄塘。

资料来源：《嘉定县政概况》，第一编，《民政》，1936 年 2 月。

① 1924 年，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争夺上海，兵刃相见，史称“齐卢战争”或“江浙战争”。“齐卢战争”历时 40 余天，祸及嘉定全境，全县死难约 4 000 人，流离失所者 10 万余人，《嘉定县志》，卷 24，《军事·齐卢兵祸》，第 757 页。

② 《嘉定县志》，第六编，《社会·人口家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976 页。

主要市镇先后建立^①,嘉定市镇人口的职业构成也随之开始发生变化,这一点在1938年日伪嘉定县政府对全县户口的职业调查中已经有所体现(见表8)。

表8 1938年嘉定县户口职业调查

城乡别	人口	农	工	商	学	政
城市	4970	248	600	716	34	103
外冈、葛隆	14302	6832	1861	652	6	8
望仙、钱门	11858	7900	1190	688	4	2
安亭、西胜	13395	8021	697	866	7	2
黄渡	12907	7863	1222	836	5	4
南翔	5283	838	957	1126	4	9
纪王、诸翟	12849	9021	1031	617	3	3
娄塘、陆渡	20930	14014	3212	1414	7	13
徐行、澄桥	16597	8276	3601	1918	8	6
其他乡镇	137523	82399	14010	7672	50	55
小计	250614	145412	28381	16505	128	205

资料来源:《嘉定县户口职业调查表》,1938年12月,《嘉定县政概况》,1939年4月。

民国前期,宝山、嘉定的市镇经济与市镇人口的发展都已相当程度地受到了上海城市经济的影响,但两者又有所区别。1910~1926年间,宝山南境近代工厂大量建立、工业人口急剧增加,宝山全县的城乡人口结构也已经向近代类型转变。嘉定由于离上海稍远,受近代工商业影响较慢。1911~1934年间,由于洋布与洋靛的输入,嘉定传统市镇经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加上战争的破坏,市镇经济未能得到发展,市镇人口的职业结构也基本保持着传统的格局。1936年后,嘉定市镇的工业人口开始超过商业人口,并逐步向近代市镇人口结构转变。

因而,民国前期宝山南境市镇经济与市镇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最终并入上海市,不仅是一个上海城市经济逐步扩张的过程,还是一个“区域人口城市化”的过程。而同一时期嘉定市镇人口的增长,则基本上还是一个“乡村工业化”的过程。宝山与嘉定市镇经济与市镇人口发展状况的不同,实际上体现了近代工业与洋货输入对传统市镇经济影响的差别。

宝山与嘉定市镇经济与市镇人口的发展的差异也说明,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能量聚集过程,在城市本身商业机能获得充足发展以前,其对周边农村的人口的城镇化进程具有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闸北自治区的建立与并入上海市和吴淞商埠计划的“胎死腹中”,则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讲,上海黄浦江一带经济的深度发展限制了宝山、吴淞的发展,而嘉定市镇经济与市镇人口发展的停滞,一方面说明了在外来经济势力冲击下,传统市镇经济的脆弱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时上海城市经济能量辐射的有限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造和中国人口城乡结构的转型实在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刘石吉(1987):《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包伟民主编(1998):《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
3. 侯杨方(2001):《中国人口史》,第六卷,《1910~195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
4. 曹树基(2001):《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
5. 汪敬虞(1989):《贺璧理与黄浦江的疏浚》,《上海研究论丛》,第二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6. 徐新吾主编(1992):《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朱 犁)

^① 《嘉定县志》,第二编,《经济》,卷5,《工业》。

the migration rate curves differ significantly by sex. Factors such as educational level, population moving policie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also have strong impacts on the model migration schedule.

Study on Social Security for the Once Family Planned Elderly Couples in Rural China

Li Jianmin • 40 •

Traditional arrangement of famil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is built on the mechanism of inter-generation exchange of economic resources within family. This traditional arrangement has been challenged by the faster economic, social a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Because the human resources supporting the once family planned elderly couples has been slashed, the probability of poverty for these couples will increase greatly, if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timely implement effective supporting policies. It is the policy of family planning which reduces the transitional economic resources supporting the elderly family planned couples in rural areas, so the government has responsibility to institutionalize a mechanism in securing them. To establish the social security program for the family planned couples in rural areas is the best way to compensate the loss of the couples due to complying with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Urban Population of Baoshan and Jiading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You Huansun • 49 •

The evidences provided by this article show that the structure of the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of Baoshan has started a transition to the modern type, while that of Jiading still kept a traditional style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hanghai requires a great conglomeration of economic energy before the full growth of commercial enginery.

Village-level Organization and Its Public Service in Tibet: Sevenscases in the Tibetan Rural Areas *Zha Luo* • 57 •

With the exemption of agricultural tax desired in accordance with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improving welfare service in the Tibetan rural areas, the village-level organization in the area is able to combine the villagers' willingness and the government's tasks. This also makes local public services better meet the villagers' basic needs. Through examining the public services provided,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village-level organizations have become the major providers of public services in rural Tibet. Despite the insufficiency of resources, the village-level organization still, with the help of Lamas and local celebrities, gain a wide support so that the villagers can enjoy timely and effective public services.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Cross-Nation Marriage in Modern Shanghai

Ding Jinhong and others • 66 •

Although started late, cross-nation marriage has developed quite fast in China. Shanghai is one of the areas with more cross-nation marriages. There has appeared a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numbers of cross-nation marriag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city. The majority of the couples are in the "lean style" with Shanghai females marrying overseas males. Nearly half of the correspondents are remarried after divorce. The average age at the marriage is relatively old, while the age gap between the couples is larger. These couples belong more or less to well-educated upper strata. In the process of matching there are more trading and even cheating than true love.

A Review of Urban Minimum Living Standard Program: Problems and Policy Options

Yang Lixiong • 71 •

The urban minimum living standard program initiated in China in 1993. After more than ten years development, a relatively standardized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the livelihood of the urban poor has been basically ensured. However, the program is not sufficient in supporting the urban poor since it is bond to emphasize the subsistence issue but not the development issue. Implementing the social policy of eliminating social exclusion therefore is urgently needed.